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时的教育既反映了隋唐五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进步,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典型形态。

本书旨在以严肃的历史事实的陈述为前提,把隋唐五代的教育及其中的具体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通过对当时宽松、开放、灵活的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和动力;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及其运作机制、教育内容、教材审定、教育方法的提倡;社会对人才规格的规定和选拔方式的演变、成熟以及科举考试的完整制度和方法的确立、对当时及后世选拔人才的意义;作为当时灿烂的物质文明的直接中介的实科教育及形式;作为整个时代的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的教育思想及其承绪等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和评价,力图从中找到那个时代教育兴衰的脉络,体悟教育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从而于现实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有所鉴益和启发。

目 录

中国隋唐五代教育史

一、隋唐五代教育概述	1
(一) 帝国初创与隋文帝文教政策的摇摆	3
(二) 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与儒术重振	7
1. 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改革	7
2. 从“马上得之”到“守成以文”	9
3. “大闡文教”的措施及成就	12
4. 三教并重及其对经学教育的影响	21
5. 对传统经学的怀疑与重构	27
(三) 五代的衰落与印刷术的发明	37
二、学校教育	40
(一) 隋初的学制设想和文帝对学校教育的怀疑	40
(二) 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运作	44
1. 唐代的中央官学	56
2. 唐代的地方官学	73
3. 留学生教育	82
4. 唐代学校的教材建设及其变革	84
(三) 战乱中衰微的五代学校	101
(四) 隋唐五代的私学	102
1. 民间私家讲授	103
2. 山林讲学	104
3. 寺院讲学	105

(五)唐末五代的书院	107
1. 官立书院:集贤殿书院	107
2. 私立书院:读书治学之所	112
3. 白鹿洞书院:宋初书院的典型	115
三、科举考试	118
(一)从“九品中正”到“设科举士”	119
(二)在争议中行之有效的唐代科举考试	125
1. 考生的来源与报考办法	126
2. 考试的科目、内容与方法	130
3. 录取和出路	145
4. 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和士子学风	151
(三)五代的人才选拔	161
四、实科教育	163
(一)实科学校教育	164
1. 医学专门学校	164
2. 算学专门学校	167
3. 天文、历法专门学校	170
(二)实科教育的其它形式	171
1. 私学家传	172
2. 佛道传艺	173
3. 经师兼授实科知识	175
4. 手工作坊的艺徒制	175
(三)实科专业教材的颁定	177
(四)实科教育观	180
1. 实科人才的基本要求	180
2. 实科职业道德教育	180

五、教育家的活动和教育思想	184
(一)王通对唐帝国的贡献及其“安邦育人”的教育目的论	184
(二)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其教材论	188
(三)韩愈、柳宗元的师道论	195
(四)李翱教育过程本质的“复性”论	207
1.“无虑无思”	210
2.“其心寂然”	210
3.“慎独”	211
4.“择善固执”，“终岁不违”	211
六、结 语	213

一、隋唐五代教育概述

隋唐五代的教育包括公元 581 年至公元 960 年的长达 370 余年的教育历史。这一历史时期,既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最有成效的时期。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为古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奠定了古代社会后期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国家法定的意义和保障。

第二,适应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帝国的形成和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以儒学教育为主体的层次严密,上下贯通,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完整的学校体系,并且从教育政策、方针、目标、设施、教材、教师、学生各方面给予了系统的保障。尤其是私学和书院的发展,作为古代国家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为教育力量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古代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了较为客观、公正和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考察制度,使社会的人才选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学校育人与社会选人用人有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学的风气。

第四,建立和实施了系统的实科教育体系,使古代教育具有了多元化的结构和功能,对于当时社会物质文明走向鼎盛发展,发挥了实际作用。

第五,在教育思想上,适应儒学思想的第二次变革,在总结前人的理论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经学教育思想向理学教育思想转化的方式、途径及其理论形式,初步提出了理学教育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为宋以后理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了理论准备。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隋唐五代三百多年时间,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和昌盛。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维护其统一的政治统治,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基础和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内,都自觉地采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些改革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物质条件,使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集中的、等级分明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系;要求有统一标准的教育内容和配套成龙、自成体系的教育方法等等,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客观地促进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古代社会的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达到了一种相当的和谐和统一。

(一) 帝国初创与隋文帝 文教政策的摇摆

隋承北周而立国。北周晚期外戚隋国公杨坚总揽朝政,公元581年废周静帝,立国于长安,改元开皇。公元589年灭南朝陈国,从此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三百多年的战乱和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虽然隋朝国祚太短,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但它在客观上为唐朝的继续改革探索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构思了基本的思路和规模框架。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在政治体制上,隋的中央官制废除了北周所置的六官,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地方官实行州县两级制。这一措施不仅裁汰了一些冗官,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政府节省了开支,而且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政治的统一。军队管理实行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高祖纪》),这一措施不仅加强了政府的武装力量,而且将军事统率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支持了中央权力的上升。此外,宽简刑制,缓和了社会矛盾。用科举制度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打破了门阀大族把持选举的局面,把选举权集中到中央吏部,这不仅削弱了地方士族的势力,加强了皇权,而且也利于当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经济上,隋唐继续实行均田制,一方面限制了地方贵族对土地的兼并和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和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消除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障碍,逐渐形成了东西二京两

个最大的商业都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隋书·地理志上》)。东京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市周六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七十二行,三千余肆。薨市齐全,遥望一加,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大业杂记》);北市通远,周围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同上),国内边疆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都曾入市交易,可见当时商业贸易是相当繁荣的。

伴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隋朝统治者在文教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由于历史的大转轨,对新旧意识形态的选择和新旧意识形态本身的转化以及适应新社会的功能所必需的调整,隋朝的文教政策在肯定传统儒家学术的基本思路的前提下,曾出现过某种动摇和怀疑。

一方面,在肯定儒学的同时,对佛、道二教也并不放弃。隋文帝杨坚幼年时寄养在尼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大力提倡佛教。实质上,隋文帝已经认识到佛、道、儒三教可并用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文帝即位之初,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由官府写经置寺内,风靡全国。于是“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百倍”(《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时期,是其被中国文化吸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而隋唐时期,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主要贡献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

的佛教哲学。这一工作随着隋文帝对佛教的提倡而逐渐开始了。

道教尽管在争夺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隋统治者对其基本采取调和的态度,不仅儒道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和儒学也可以调和。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

另一方面,对儒学的态度也时冷时热,时扬时抑。隋文帝杨坚认识到,三教虽可并用,但作用不同,要使人民顺从地遵守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服从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训练从政的官吏,便要依靠儒学。故儒学又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推崇。

自从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学定于一尊,曾促进了儒学教育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佛教和道教相继兴起,儒学一度衰微。隋统一中国后,在三教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儒学开始有所复兴。文帝即位,曾采纳牛弘建议,广泛征集儒学经典。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由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后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当年周武帝时,积累书籍已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如今共有三万七千余卷,含重复本达八万卷。隋文帝又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书”。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宫中。隋炀帝时,又将儒学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炀帝将所有书藏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

隋朝又借全国统一,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使儒学中的“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这是经学教育的一个重大改革和发展。

由于隋文帝积极振兴教育,一度出现了学术与文化的昌盛景象:

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问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隼,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核。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

同时,隋文帝还注意搜罗儒术人才,用重礼聘请,许以高官厚禄,把著名的儒士都集中于京都。

文帝一面崇儒,一面兴学,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文帝还亲至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开学典礼),奖励国子生,考选国子生为官。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令劝学,强调设学施教是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进行礼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589年统一全国之后,又令所有学校都要勤训导、严考课。

但终隋之世,儒者的地位在统治者心目中始终没有能真正提高。《隋书·儒林序》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由于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始终未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便几乎断绝。隋朝最著名的儒生仅刘焯,刘炫二人。刘焯因计较束脩(学生交纳给老师的学费),声名不佳;刘炫曾借隋炀帝购求书籍之机造伪书百余卷,骗取赏物。所谓巨儒必鄙俗,不

受重视,可见一斑。文帝晚年,崇佛更甚,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使佛教在短短的时间里几成国教。儒学和佛道的地位相距愈远。公元600年,隋文帝诏令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而第二年却藉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一处,学生名额七十。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但就在当天,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助佛排儒。隋炀帝恢复学校,但仍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许多生徒参加窦建德的瓦岗军,足以说明朝廷对儒生的态度。隋文帝晚年的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另一个宗教来,其结果更坏,它使隋王朝丧失了正统的意识形态,加速了统治基础的崩溃。后来的唐王朝由此认识到,三教都是可为统治秩序服务的,同时并存,各有其用,不能偏废。

(二)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与儒术重振

1. 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改革

唐朝在隋末的混乱中以反隋而立国,高祖李渊本也为隋朝命官,于公元618年在长安称帝,又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在隋朝各项未竟的改革事业基础上,继续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改革,先后出现了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强盛而先进的文明国家。

所谓唐承隋制,唐朝各项集权政治的措施,多是继承隋朝而加以变化。唐初帝王特别是唐太宗,认识到“水能载舟,亦也覆

舟”的道理,以隋为鉴戒,力求除去隋朝的弊制,推行了一些革新的政策。在官制上,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更加完备,地方改隋炀帝时的郡县为州县两级,设州刺史和县令。贞观设道,开元间分天下为十六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兵制上,亦沿袭隋制,使府兵制与均田制更进一步结合,既保证了从均田制下征调兵源,减少国家常备军费,又加强了中央的军事控制力量,同时几次修订律令,宽简刑法,扩大了统治基础。在官吏选拔上,唐王朝完整地继承并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有效的组织保证。

在经济上,唐朝继续颁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这一措施巩固了府兵制,又使国家政权的纳税基础不断扩大,垦辟了不少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输庸代役,也多多少少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国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如纺织业、造船业、矿冶业、造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等等都有了显著进步,为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发展商业的措施。如发展交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仅以长安为例,有东西二市,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奇珍,皆所积集。”(《长安志》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西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揉货卖之所”(韦述《两京新论》卷三)。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商业极盛。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如西北陆地,由西域通往西亚、欧洲各国,有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以广州为最大的贸易港,东南亚各国如林邑、真腊、河陵、宜利佛逝,以至狮子、波斯、阿拉伯等国家,都到广州做生意;在东方与日本、新罗的贸易更为频繁。由于唐王

朝的各种努力,唐中叶以前近百年间,社会经济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所谓自贞观后,“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百姓殷富”,“丁壮之人,不认兵器”(《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政治的稳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政治基础和物质保证,也提供了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要求,唐代的教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

2. 从“马上得之”到“守成以文”

一定社会的文教政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反映,唐王朝的文教政策也不例外。唐王朝立国前后的政治转变和战略方针的调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李唐王朝是在马上得天下的。七世纪初,在农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隋政权分崩离析。“隋失其鹿,群雄角逐”,各地地主豪强纷纷拥兵自重。李渊、李世民军事集团勃起于太原,西进关中,夺取政权,建立李唐王朝,接着便开始了一场艰巨复杂的统一战争。指挥这场战争的主要人物是李世民。他持续七、八年,驰骋沙场,东征西讨,翦灭群雄,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战争结束后不久,李世民以“功善天下,中外归心”继承帝位。当时,国内由于长期军事动乱,民力受到严重损伤,生产破坏,经济衰微,再加上边境冲突不断,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新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怎样才能使年轻的李唐王朝得以巩固?使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治理?对此,朝廷里发生了两次激烈的辩论。第一次围绕战后如何治国的重大问题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的忠实将领、天策府长史唐俭向李世民提出:“汉

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谏议大夫魏征向李世民提出“偃武修文”四字方略(《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所谓“偃武修文”,就是停止用兵,停止军事行动,实行“文治”。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魏征的四字方略,符合战后形势需要,因此深得李世民称赞。但是,以宰相萧瑀、副宰相封德彝为首的不少朝臣却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打天下靠武力,治天下也要靠武力。“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权威”,“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同上)。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实际是反对魏征“偃武修文”的“文治”主张,认为“文不及武”。在两种对立的意见面前,李世民“审时度势”,认为:“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贞观政要》卷一)最后作出结论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十六个字表明李世民断然否定了“文不及武”的意见,采纳了魏征“偃武修文”的主张。其中“守成以文”四字完全肯定了魏征的“偃武修文”四字方略,成为贞观“文治”的指导思想。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动乱转向安定的过渡时期,李世民接受隋炀帝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及时地改变战略,由“戡乱以武”转为“守成以文”,从“武功”转到“文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有利于扭转隋末动乱留下的衰微局面,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社会文化的兴盛和发展创造了前提。“守成以文”,其特点是“文”,要实行“文治”,必须要有文化。因此,李世民十分重视统治者的文化修养,认为:“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之有也。”(《贞观政要》卷四)又说:“为人大须学问,……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同

上,卷六)“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同上,卷七)这和隋文帝晚年“不悦诗书,废除学校”(《隋书》卷一《高祖》下),轻视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守成以文”方针确立以后,围绕着对人民“施行教化”(《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的问题,在朝廷展开了又一次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中心是能不能对人民“施行教化”?要不要“施行教化”?要不要发展文化?魏征认为国家处于大乱之后,人民“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同上)极力支持对人民施行“教化”的主张。以萧瑀、封德彝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则极力反对。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三代以还,人渐浇讹(变坏)。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教)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贞观政要》卷二)李世民针对封德彝的观点提出置问: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什么很快就败亡了?萧瑀认为秦统一六国是错误的,说:“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所以败亡。李世民当即予以反驳,认为秦亡的原因主要在于统一六国以后,“专行诈力”,不施教化而实行残暴统治的结果。不难看出,萧瑀、封德彝主张“任法”和“杂霸道”,实质是要国家施行“苛法”、“武力”统治,而李世民、魏征主张施行“教化”,其意图是用“仁政”、“文治”促进社会安定。这场辩论不单纯是文化上的“教化”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如何治国的问题,是第一次辩论的继续。通过辩论,李世民“卒从征言”,决心发展文化教育,“大阐文教”(《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他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而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水,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他领会到人性美必须学成,进而注重对所任用官吏“德行、学识”的要

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他对侍臣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李世民把官吏“学识”与“德行”作为同样的要求,认为除必备社会要求的“德行”外,为了培育具有“识前言往行”能力的官吏,就必须使官吏有“学业”,因而,重视国学建设,发展学校教育成为唐太宗治国的重要策略之一。李世民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他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强烈震撼中,在山河改姓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感受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八)严峻的历史事实迫使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最后提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同上,卷五)把两场辩论的结果联系起来看,不难理解,“大阐文教”是李世民推行“守成以文”方针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当时唯一的客观的选择。这一战略部署的确立,表明李世民为发展社会文化迈开了步伐。李世民实行这一战略部署的决心很大,他的诗作中就有“戢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全唐诗》卷一)这样的句子,表达了他的决心和意志。

3. “大阐文教”的措施及成就

在“守成以文”的方针指导下,李唐王朝采取了许多“大阐文教”的措施,为发展社会文化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1) 尊孔崇儒

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伊始,即“颇好儒臣”,除设立儒学外,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下诏兴仕崇儒,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又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亲自到国